



>> 一个“问题中人”而非“学问中人”

1918年11月7日,前清民政部员外郎、学者梁济与儿子梁漱溟讨论关于欧战的新闻,随口问道:“这个世界会好吗?”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教师的梁漱溟回答说:“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。”梁济点头:“能好就好啊!”

三天之后,目睹清末时局混乱,社会失序,人心堕落,决心以死唤醒世人的梁济投水自尽。他留下遗书发问:“国性不存,我生何用?”这一天,距他六十寿辰仅有四天。

梁漱溟深知父亲的死绝非为逃避现实社会,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捍卫,因此他决心承担起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任,“这个世界会好吗”成了他一生探寻的问题。

梁漱溟多次表白自己不是“学问中人”,而是“问题中人”,其一生所深切关怀的是两个问题:一是人生问题,对应近代以来中国人面临的心灵问题;二是中国问题,对应晚清以来中国的社会政治危机。梁漱溟对两大问题的回应并不相同,主张以佛教来解决人生的问题,以儒学来解决社会的问题。

小时候梁漱溟参加活动较少却爱思考,神情严肃,少年老成,同学给他起了一个外号“小老哥”,十四五岁就开始为人生问题所困惑。他看到家中女工每天忙忙碌碌,做饭、洗衣、干杂活,很是辛苦,可对方却不觉苦,脸上常有笑容;自己虽深受家人宠爱,衣食无忧,学业顺利,内心却十分苦闷。他反复思索后得出结论:人生的苦乐与外部环境无

关,重要的是自己的内心。

他早年受父亲传统儒家观念的影响,上中学后接受了新式教育,并对报纸上的新闻与时论产生了极大兴趣,“心灵隐然萌露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”,中学毕业后即踏入社会,成为《民国报》的一名外勤记者。

往来于各种社会场合,接触各色人等,梁漱溟了解到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阴暗面。街上一白发老人拉人力车,坐车的催着快跑,老人一急,跌倒在地,下巴磕出血来,染红白胡须。他在旁边看到,“眼里也掉出泪来”,暗暗发誓“从此一生不坐人力车”。他亲身经历了袁世凯一手导演的吓唬袁世凯的“兵变”闹剧,也亲眼目睹了袁世凯窃国得逞之后举行的临时大总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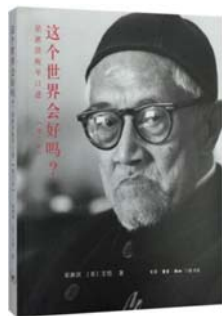
宣誓就职大典,越来越感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。社会良心觉悟使他“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”,曾两度自杀未遂。

1912年梁漱溟退出《民国报》,“谢绝一切,闭门不出,一心归向佛家,终日看佛书”。佛学使他深悟人生原本是苦难之旅,接触到的儒家学说却使他不再认为“人生是苦”,而是抱持一种乐观态度。直至1917年,梁漱溟的佛教信仰发生动摇,加上第二年父亲之死给他以强烈的心灵震撼,“中国问题逐渐占主导地位,人生问题逐渐退居次要地位”,受蔡元培之邀,他以既无学历又无资历的自学青年身份进入北大讲授印度哲学,并决心对“孔子、释迦两家的学术在课堂上负一个讲明白的责任”。

“最后的儒家”梁漱溟——是行动派,也是少数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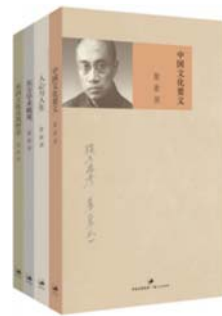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世界会好吗?年轻时,梁漱溟以肯定的语气回复了父亲梁济的疑问。此后漫长的人生中,梁漱溟在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《人心与人生》等著作中探讨中国与世界文化,并以行动让世界向好发展。他不囿于书斋,而是深入乡村,奔走后方,调停内战,立德、立功、立言,展现了一个文化托命之人的担当。今年是梁漱溟去世三十周年,翻看这位最后的儒家的履历,我们发现他不仅是一位行动派,更是一位少数派。



《这个世界会好吗?》
梁漱溟 艾恺 著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

《朝话》
梁漱溟 著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《中国文化要义》
《人心与人生》
《东方学术概观》
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
梁漱溟 著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本报记者 曲鹏

>> 一个本着思想而行动的人

五四运动之后,新文化运动兴起,以一切西方文化为标准,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,梁漱溟却信心十足地宣布:“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。”1921年暑假,受山东省教育厅之邀,他在济南讲授东西方文化问题,一连讲了四十多天,由当时随行学生,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的罗常培记录整理,随即在山东铅印成书出版,这就是梁漱溟的成名作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,他由此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先驱。

在北大执教七年后,由于“对当时学校教育只注意知识传授,不顾及指引学生的全部人生道路不满”,梁漱溟辞去北大教职,投身新教育和乡村建设;抗战中,他巡历敌后游击区8个月,敌兵围堵,飞机轰炸,数次险死还生,始终泰然自若;为联合救中国,他发起民主同盟,调查李闻惨案,力促国共和谈,前后奔走8年;他与毛泽东曾几次通宵长谈,激辩中国道路,1953年因向最高领袖“要商量”,成为“反面教员”;1971年,他只批林不批孔,再遭全国性

大批斗而不改初衷,傲然宣称“三军可夺帅也,匹夫不可夺志”;1975年《人心与人生》完稿,前后费时约50年,称“使命完毕,可以去矣”。

梁漱溟曾说,假如有人向他的朋友问起他是怎样一个人,朋友回答“他是一个有思想,又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”是恰如其分,最好不过的。

美国学者艾恺曾出版《最后的儒家: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》,把梁称为“最后的儒家”。学者许纪霖认为“最后的儒家”只是一个象征性说

法,并不是单纯指称梁漱溟个人,而是以梁为代表的整个民国知识分子即最后一代儒家。民国时,出现了一批新儒家,包括熊十力、梁漱溟、张君勱、钱穆、冯友兰等学者,“他们执着于发展儒家的义理”,在大变革时代,新儒家的发展引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回响。“放着北大教授不做,梁漱溟居然去进行乡村建设的尝试,这是很不容易的”,在许纪霖看来,与其他新儒家学者不同,在梁漱溟身上,“儒家的实践传统表现得更为强烈、明显”。

>> 一个狂出意境与真性情的人

梁漱溟曾对两个儿子说:“前人文云:‘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。’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。”语带狂妄,但许纪霖却认为狂出了意境和真性情。

1941年梁漱溟赴港筹办《光明报》,遇香港沦陷。在一路突围安全抵达广西梧州后,他在写给儿子的家书里提到脱险经过,并自信地说: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。今天的我将可能完成一个非常重大的使命。而且没有第二人代得。从天命上说,有一个今天的我,真好不容易。我若死,天地将为之变色,历史将为之改辙,那是不可想象的,乃不会有的事!

事后梁漱溟再读这些文字,也自认“有狂妄之嫌”,却是“当时心理状态的真实写照”。

许纪霖对梁漱溟的“狂”表示认同,“使命感是儒家精英主义的根本所

系,对于一个确信自己承受了天命的狂者来说,因此而无限放大自我,将一己之自然生命与整个民族和文化的前途接通”,“狂”的背后有德性和知性支撑,因此“狂”得“有底气、有厚度”。

相比于狂,梁漱溟更喜欢“廓然大公,物来顺应”的人生态度。艾恺在采访晚年的梁漱溟时,问及他对陈独秀和胡适的看法,梁回答:陈独秀“这个人了不起”,胡适“这个人很聪明”。在长子梁培宽印象中,父亲从不在背后议论别人的缺点、毛病,认为这种事由他自己反省去就是了,在背后说来说去有什么用?

不揭短,不背后议论人,并不意味着梁漱溟处世圆滑,无视原则。在公开场合,对老朋友他也不讳言自己的看法。梁漱溟与熊十力的友谊有四十余年之久。熊晚年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儒学思

想体系,花了很大工夫。梁漱溟则认为儒学不光是著书立说,更要身体力行,并专门撰写长文对熊进行严厉批评。

怀着为天下立身的重大责任,梁漱溟长期以来一直过着完全合乎儒家道德规范的严谨生活。

在儒家的道德功夫论里,他强调慎独与自省:“修齐治平都在诚意上用功,都在慎独;慎独是贯内外的活动,亦即修身之本之实行。”“人在世上生活,如无人生的反省,则其一生就活得太粗浅,太无味了。无反省则无领略。”他的慎独之彻底,不用说平时的言行,连自己隔夜做的梦都要认真地加以检讨。1951年4月7日,他在日记中自责“梦中念头可耻”,次日又记:“思议大学修身为本疑问若干则,夜梦起念头可耻马上自觉”。他不

但反省自身,也以“朝会”的形式影响他人。在山东做乡村建设研究时,每日清晨与研究部同学团坐一起,由梁漱溟即兴讲授一些心得,以自己独特人生来为儒家作注解,据此出版的《朝话》一书在后世流传。

梁漱溟晚年给友人题写条幅,爱写“静以修身,俭以养德”。1988年6月他病危之时,学生李渊庭夫妇去医院探望,向保姆问及先生有无现成可用衣物以备后事。保姆答:“他只有一套料子中山服,已经很旧了。其余是几件灰布小褂。袜子是破的,鞋子也是旧的。”

外部的世界是未知的,但是一个人内在世界的好坏却在自己掌控之中。从这个意义上,许纪霖认为梁漱溟以他的道德的实践,儒者的担当,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有厚度的生命。